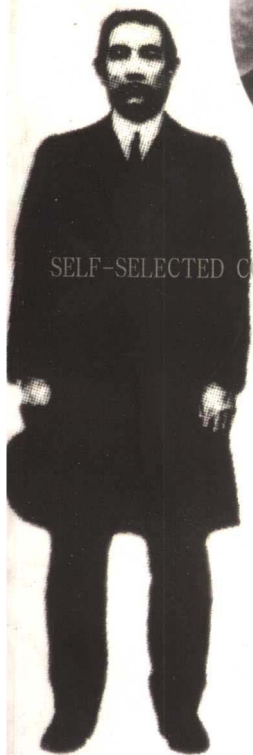


高力克 GAO LI KE

求索现代性

SELF-SELECTED COLLECTION OF ZHEJIANG MIDDLE-AGE AND YOUNG SCHOLARS



年青新



浙江大学出版社



高力克 **GAOLIKE**

求索 现代性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索现代性/高力克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10

(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集)

ISBN 7-308-02206-4

I. 求… II. 高…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②中国-现代史-研究-文集 IV. K25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516 号

求索现代性

高力克 著

责任编辑 曾建林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玉古路 20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排版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 * *

850mm×1168mm 32 开 11.25 印张 281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308-02206-4/K·032 定 价: 18.00 元

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集

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集

張浚生題



浙江中青年学者自选集

浙江中青年学者

自选集

金庸题

吾浙才雋
萃文於斯

金甯題

期待浙江学派

张浚生

奉派在香港工作了十三年,有幸参加了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伟业之后,今年四月,我回到浙江,受命主持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工作。我以为能重返国内学术圈而兴奋。

甫到杭州,走进我曾经工作过的校园,看到一群群走向教室的莘莘学子,浓浓扑面而来的,是久违了的学术空气。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感触良多。

众所周知,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大家,以下仅举其大者。汉有王充,他的《论衡》一书引用了丰富的科学资料,从多方面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谶纬神学进行批驳,发展了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自然观。宋有陈亮、叶适,他们以事功之学来抗衡、矫治程朱理学的墨

守成规、不思发展，曾经在宋代的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宋代的另大学者沈括，他的学术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更多人是认识他在自然科学中的成就，英国科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赞誉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实他的学识博大精深，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贡献。明有王阳明，他提出“致良知”说，倡导“狂者”学风，使理学中的心学一脉取得完成的形态，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写下了明代思想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其影响及于清和近代，甚至辐射到东亚一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早在17世纪中叶就创导民本制度，提出“工商皆本”学说，可以说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晚清有龚自珍，他在清王朝进入风雨飘摇之际，呼唤不为“人主”牢笼的豪杰之士，挺身而出改革社会，以“众人之宰，自名曰我”的近代命题，标志了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开端。鲁迅在中国旧社会的“寇盗”和“奴才”的包围之中，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之战士者安在”的呐喊，他的思想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他如近代的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茅盾、吴晗、马一浮等人，都是十分杰出的大学者。我发现，历代浙江学者对传统和现实持着很强的批判精神，理论思维方面具有不可拘束的创新欲望和能力。那些大学者往往是开一代风气者。这不能不说是浙江人文传统的特色和优

长。

百年浙大，人文科学传统也是蔚为大观，从求是书院开始，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曾在浙大任教或求学，如陈独秀、蒋方震、钱穆、张荫麟、郁达夫、马叙伦、沈尹默、张宗祥、钱基博、汤用彤、马一浮、郑晓沧、马寅初、王季思、夏承焘、常书鸿、丰子恺、夏衍、谭其骧、王遽常、姜亮夫，等等。他们以其杰出的人伦和学术思想，以及多方面的才干，不仅为浙大奠定了雄厚的人文传统，而且具有全国甚至国际性的影响。浙大文科的优秀传统和强大实力，他们有首创之功。目前浙大人文学科的老中青专家教授，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血脉。

“江山代有才人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浙江涌现出一批学术上卓有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集中于浙江，有些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逐渐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学术群体，并将在跨世纪的文化接力中发挥中坚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为这一批中青年学者出自选集，把他们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既是对他们学术生命的一次检验和考察，也是对浙江学术界的一个促进，从而激励更多的年轻学者急起直追，汇成学术上奔流不息的钱江大潮。

但是，促使我深思的却是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浙江学术界尤其是浙江大学的学术命脉是否得以延续和光大。这就是：如何继承浙江优秀、绵

长的人文传统,推动学术进步,形成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浙江学派。今天,我把它提出来,希望与所有浙江中青年学者共勉,也希望他们为此作出扎实而有成效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具有全国和国际影响的学派。

新的浙江大学的建立,我们有了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的大学,这为文科和理工科以及其他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创造了条件。不同学科间的启发、贯通和综合,必将启发灵感,拓宽视野,有利于学者提出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的学术观点,有利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任何前人都具备的优势。

我相信,以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龙头,加上全国浙江学者的努力,上述历史使命的完成是可以期待的。现在我校出版社所推出的这一套丛书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

面对中青年学者的力作,不揣浅陋,谨缀数语于书前,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于求是园

目 录

上编 启蒙时代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比较	(3)
公民时代:陈独秀的启蒙思想	(21)
胡适的新人生观与中西文化	(48)
《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传统	(63)
《新青年》经济伦理变革及其限度	(80)
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96)
杜亚泉的多元主义价值观	(115)
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134)
现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激进主义	(151)

下编 现代中国

康有为思想中的现代性与乌托邦	(199)
从维新派立宪观到自由主义革命观	(220)
李大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234)
孙中山自由观的内在矛盾	(247)
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思潮	(259)
调和思想与中国现代性	(289)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乡土中国现代性·····	(304)
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平等主义困境·····	(319)
现代性的分裂及其悖论·····	(335)
学术自传·····	(345)
论著目录·····	(349)

上编 启蒙时代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启蒙思想比较

中日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颇富挑战性的学术课题。本文拟通过日本和中国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思想的比较,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日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差异。本文把研究时限定于明治时代和戊戌辛亥年间,因为这分别是福泽和梁氏启蒙思想生涯中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日中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洋学者与士大夫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在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出身于下层武士家庭的福泽,幼年丧父后,是在自由放任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他直至 13 岁始入村塾,学习《孟子》、《论语》、《左

传》、《诗经》等。1854年,19岁的福泽赴长崎学习“兰学”。翌年去大阪入绪方学塾,学习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电学等自然科学。1859年,福泽转学英语。60年代,他三度游历欧美,周游美、法、英、荷、德、俄、西、葡诸国,广泛接触和了解西方文明国家的文物制度。著名的《西洋事情》,即福泽根据自己游历欧美的见闻所写。福泽游历欧美还带回许多西方书籍,这些西书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还一度在幕府的“外国方”担任英语翻译,广泛接触西人西事。总起来说,福泽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洋学者”^①。福泽的事业生涯比较单纯,他坚持终生在野,不介入实际政治活动而倾毕生精力于教育和著述。他的思想影响及于国民和政府两方面,从而扮演了近代日本“文明指导者”和“文明开化巨匠”的角色。

梁启超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则迥然相异。他4岁起从祖父和父母读四书五经,8岁学作八股文。少年时入学海堂攻训诂词章之学,成绩优异,得各科大考第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后从师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攻读《公羊传》、《资治通鉴》、《诸子语类》等,并开始涉猎译本西籍。梁氏流亡日本前未出过国门,他有限的西学知识主要来自西籍译本,因而难免零散而肤浅。就知识结构而论,梁氏去国前基本上是一个浸润于传统的新型“中学者”。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福泽和梁氏思想的形成发展来说,前者广阔的西学背景和后者深厚的中学功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梁氏是由参政而步入社会舞台的,戊戌时期他随其师康有为发起“百日维新”,被卷入了近代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戊戌维新失败后,梁氏将主要精力投入思想启蒙活动,同时仍积极参与组党和立宪运动等实际政治活动,辛亥革命后更出任袁世

^① 关于福泽的生平,参阅《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凯政府的司法部长、币制局总裁等职。梁氏一生可谓兼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学者数任于一身。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日本的新气象使其耳目一新。他借助“和文汉读法”，“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①。福泽是对梁氏最具影响力的明治思想家之一。梁氏对福泽推崇备至，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曾以《日本维新二伟人》为题，刊印了福泽谕吉和西乡隆盛的照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还转载过福泽的《男女交际论》和《福泽谕吉语录》。梁氏在《论自尊》一文中，力倡福泽的“独立自主”思想。他还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一篇介绍世界著名思想家的文章中，以赞誉的语气谈到，“福泽创庆应义塾，办《时事新报》，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②。深入考察戊戌以后梁氏的思想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福泽以及明治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二、文明开化与新民救国

明治时代为福泽谕吉思想生涯最为活跃的阶段。1875年，福泽出版了著名的《文明论概略》，系统阐述了代表其启蒙思想最高理论成就的文明理论。

福泽认为，“文明”就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它依赖人的智慧和道德而发展。因而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类智德的进步^③。据

① 梁启超《汗漫录》，转引自夏晓虹《梁启超与明治文化》，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5辑。

②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